

諸子考索

羅根澤著

諸子考索

羅根澤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諸子考索

羅根澤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18 • 插頁2 • 字數418,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3,000 定價 (7) ~~1.00元~~

統一書號201.94 2.50元

封面設計者：張啓亞 校對者：陳尊是等

序 言

這裏所收的文章，都是對先秦以及漢代諸子的考證和探索，所以題名諸子考索。戰國策是歷史書，別錄是目錄書，但前者保存着許多縱橫家的資料，後者論述了諸子，因此把考索這兩書的文章，也收入作為附錄。

這些文章，除了潘辰先生的試論戰國策作者問題及我同他的商榷兩篇，都寫於解放以前，絕大部分都曾收入諸子叢考和續考，即古史辨第四冊和第六冊，少數曾單本出版，其餘也在各雜誌發表過。解放後，由於個人教學任務的不再包括諸子，因而沒有再寫這方面的文章。雖然也曾寫過一篇先秦散文選序，又寫過一篇論莊子的思想性，但都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不是考證，也不是探索學術思想，因而這裏沒有收入。

諸子叢考和續考都廣泛地輯錄各家論文，這裏除有關聯必須附入者外，只限於個人的撰述。叢考自序敘述了自己一點不成熟的研究諸子計劃，這裏作為舊序。續考自序敘述了歷代學者考證老子年代的總成績，這裏就內容改題，收入書中；又撮錄近十幾年的各家研究，寫成跋語附後。

編排次序：先通考；次通論；次墨子，附對於名墨的討論；次老莊；次孟荀，附子莫；次名家，附小說家燕丹子；次管子；次商君書和慎到；次西漢諸子，附戰國策和別錄。總計三十六篇，內包括他家論文二篇。除了對他家論文只作了文字校勘以外，自己的文章還

作了必要的修改，但基本上仍保存着原來面目。個別的字句更動不算，凡對內容有增刪，都分別註明。又以不同於叢考和續考的並列各家論文，因而有的地方不能不略加新註。還有各文繫年，現一律改標公元，以便容易看出它的年代及與現在的距離。內中的管子探源一種，郭沫若先生曾在蘇聯紀行向史登博士評介說：“雖然也並不就是結論，但它確實提出了好些新的問題。”是的，其他各篇，也都不敢希望就是結論，也都只希望能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研究批判。不用說研究歷史和學術思想，就是考證，也必須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可是這些文章都寫於解放以前，那時雖也曾求索，但始終徘徊在宮牆以外，因而一定有許多錯誤，敬請讀者指正。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大學。

265/13

目 錄

諸子叢考舊序.....	1
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	13
附：跋	62
晚周諸子反古考.....	63
古代經濟學中之本農末商學說.....	106
古代政治學中之“皇”“帝”“王”“霸”.....	115
古代發現“人”的歷史.....	130
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	145
“墨子”探源.....	164
與張默生先生討論名墨書.....	195
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	207
再論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	220
歷代學者考證老子年代的總成績.....	257
附：跋	279
“莊子”外“雜篇”探源.....	282
孟子傳.....	313
荀卿遊歷考.....	361
荀卿年代補考.....	372

孟荀論性新釋·····	377
子莫考·····	385
“鄧析子”探源·····	389
“尹文子”探源·····	398
“莊子”“天下篇”的辯者學說·····	410
“燕丹子”真偽年代之舊說與新考·····	416
“管子”探源·····	422
“商君”書探源·····	501
慎懋賞本“慎子”辨偽·····	511
慎懋賞“慎子傳”疏證·····	522
“孔叢子”探源·····	530
陸賈“新語”考證·····	536
“新序”“說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	540
“戰國策”作始蒯通考·····	543
“戰國策”作始蒯通考補證·····	546
跋金德建先生“戰國策”作者之推測·····	548
附：金德建先生：“戰國策”作者之推測·····	552
潘辰先生試論“戰國策”的作者問題商榷·····	559
附：潘辰先生：試論“戰國策”的作者問題·····	565
別錄闡微·····	570

諸子叢考舊序

爲說明這本書的編著的原因，不能不略述我研究諸子的志趣；
爲說明我研究諸子的志趣，又不能不略述我對於整個學問的志趣。

大約在五、六年以前了，一位朋友問我：你時而弄弄文學，時而弄弄哲學，又時而弄弄考據學，到底要做什麼學問？這樣一問，我茫然了；迴想過去，瞻望將來，渺無涯際的學術界，我這無柁的小舟，何處是停泊的地方？做考據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學吧，理智又時來搗亂。做哲學吧，哲學要有己見；我呢，覺得凡是己見，都不是最終的真理，最終的真理在若干哲學家之己見的中間；我反對己見，當然不配研究哲學。可是哲學、文學、考據學，又都在被我愛好。那末怎麼辦呢？經了這一次的徬徨，最後體察出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自己沒有己見，因之缺乏創造力，不能創造哲學，亦不能創造文學。但亦惟其沒有己見，因亦沒有偏見，最適於做忠實的、客觀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愛好哲學而得到的組織力與分析力，因愛好文學而得到的文學技術與欣賞能力，因愛好考據而得到的多方求證與小心立說的習慣，來做整理中國文學和哲學的事業。由是擬定了以畢生的精力，寫一部忠實而詳膽的中國文學史和一部中國學術思想史。爲什麼不叫中國哲學史呢？因爲有許多在中國思想史上佔地位的學說，却不一定合於哲學的定義，所以不如叫學術思想史之操縱自由，而避去許多勉強牽附和略

去重要學說的弊病。

我做中國文學史的計劃，已見我出版的樂府文學史；近來稍有變更，留待正在印刷的中國詩歌史（新註：未印）裏詳說。

我做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計劃，擬先將中國學術思想分爲四個時期：

（一）自上古至東漢之末（約二二〇年），雖然已和印度發生了一些關係，但學術思想界並未受多大影響，可以叫做“純中國學時期”。

（二）自魏初（約二二一年）至五代之末（約九六〇年），印度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界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雖然那時有人提倡三教合一或兩教合一，但那更顯示了三教不合一的事實；新加入的印度學與舊有的中國學爭鳴，可以叫做“中國學與印度學之交爭時期”。

（三）自宋初（約九六一年）至清之中世（約一八〇〇年），中國學與印度學由長期的爭辯而趨於混合，三教合一之說由宣傳而至於實現，產生了中印混合體的所謂理學。清代學者如顏元戴震諸人，雖極力反對理學，而結果不過是理學的修正，造成一種新理學。這種理學與新理學（或稱反理學）的時期，可以叫做“中國學與印度學之混合時期”，也可叫做“新中國學時期”。

（四）自清中世（約一八〇一年）至現在，西洋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界佔有了重要地位，此種“新思潮”與舊有“國故”爭鳴，可以叫做“新中國學與西洋學之交爭時期”。

依黑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將來總有“新中國學與西洋學之混合時期”，不過要等待一個相當的年代罷了。

因了時間的關係，截至現在，我所研究者還只是第一期——純中國學時期。這一期因學術的領域不同，可以分爲經學與諸子學兩類。我現在所研究的，還只限於諸子，這是因為我對諸子特別愛

好的緣故。我之愛好諸子，似與我的性質有關。我究竟是一個喜新好異的人，雖然因了自己是研究中國學問的，每被人以“骨董”詆之。在諸子書中，可以看到各種相反的論調，可以看到類似而不同的主張；看孟子把墨子罵了個不亦樂乎，看墨子却又有他獨到的見解。這些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言論，最足以滿足我這喜新好異的嗜好。由是諸子遂如膠似漆的做了我的最親密的伴侶。這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關係了。

我對於我這最親密的伴侶，最初只是欣賞，只是愛好；放在客觀的地位而加以研究，是近十年的事。這十年的經過，迫於“時光老人”的命令，不能敘述；此下便直截了當，說我積十年以至今日所決定的研究計劃。

我的最後的目的，只是寫一部詳贍而有系統的學術思想史；但著手工作的步驟，則打算先從事於一個人、一部書、一個問題的研究，然後再作綜合的研究。所以我之整理諸子，擬分為五種研究：

(一) 人的研究——此種研究的重要性與方法論，近人言之者甚多，我也沒有什麼新奇可喜之論。從事於這種研究者，曾有錢穆所作一部三十多萬言的先秦諸子繫年考辨。至我的企圖則在寫一部諸子評傳。我覺得諸子的精神，許多是值得我們崇拜的，尤其是孔墨孟荀。要表彰他們的精神，年表遠不如評傳。而且年表只是供人“看”的，評傳於供人看以外，還可以供人“讀”，看遠不如讀之可以得到具體的印象與深切的感動。所以我希望先博稽詳考以搜索他們的史料，然後用有力量的文筆為他們各作有史的價值與文學價值的評傳。可惜我所作訖者僅有孟子評傳一種（商務印書館出版），而文筆又非常脆弱，不能表彰孟子的精神。

(二) 書的研究——此又分為二種：

(1) 文字內容的研究——此又分為四種：

(a)校註——這是中國舊學者最擅長的工作，尤以清代的“漢學家”，差不多都是校註專家，他們的成績真是算乎不可幾矣。但一，他們最注重者是經書，子書非其所急。到清末纔以治經之餘，漸及於子，因為歷史很短，所以子書中尚有應校註而未校註的贗義。即最普通的墨荀韓呂，他們雖已曾經致力，但講不通的地方仍然甚多。至若先秦的管商，漢代的論衡申鑑之類（友人劉盼遂先生有論衡集解一書，甚精博，近擬付梓），其須用校註之處更多。二，我們比他們生後若干年，有新的知識供我們採用，有新的材料供我們參考。如文法是過去不甚講明而現在則極普通的知識，用以校註古書，很可以得到相當的成績。隨便舉一個例吧。墨子明鬼下“禽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滅宗無大’。”蘇輿以呂覽報更篇“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之“德幾”釋“得幾”。孫詒讓說，“蘇說是也。”其實稍微懂得文法的人，便知道他們的解釋不對：“得”為動詞，“幾”為名詞（墨沅云即幾祥字），“滅”為動詞，“宗”為名詞；“得幾無小”與“滅宗無大”正是相對為文。若釋為“德幾”便不合文法了。這並不是我們比古人聰明，實是因為古人不幸生得早些，那時文法還不講究罷了。我們既幸而得生在這種知識流行的時代，自然不應辜負它，自然應當利用它。

新的材料最普通的就是甲骨金文。因了這批材料，也可以校正古書的錯誤不少。如詩大雅生民篇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毛傳說：“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真是滑稽之至。陳奐詩毛氏傳疏覺得這種解釋欠圓滿，由是另想了一個滑稽的辦法，說：“不，皆發聲也。”不是發聲，有什麼例證？試看鐘鼎文字，丕皆作不，知道這裏的“不寧”、“不康”，便是“丕寧”、“丕康”。甲骨金文固是早已有材料與知識，但現在材料更多，研究的成績也更大，我們有了這份產業，適用以校註我們的子書，也一定可以得到比古人更多的

成績。

(b) 通釋——我以為註疏之最大的使命是訓詁，應當以簡明為原則，“粵若稽古”註十萬言，無論如何，是使讀者討厭的。但書中的重要問題，又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明的。所以我們最好於校註以外，另為通釋。清儒焦循的論語通釋便是最好的先例。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阮元的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也可以歸入這一類。我久擬寫一本荀子通釋，擬目為釋禮、釋樂、釋性、釋天、釋名、釋蔽、釋心、釋學；……惟釋禮已經脫稿（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荀子論禮通釋），餘者雖將材料彙齊，惜無暇寫定。

這種通釋的辦法，不但適用於詮釋書中討論的重要問題，還可適用於詮釋書中所用的文法問題及其他問題。如詩經的“言”字，經胡適之的通釋（詩三百篇言字解，見胡適文存卷二，古史辨第三冊下編）而其義始明；詩經的“之”字，經黎劭西先生的通釋（三百篇之“之”，見燕京學報第八期）而其義始明。但這長篇的通釋，若放在註裏，便有點不稱了，所以應當與註別行。子書也每有自己的特殊的文法，如墨子中最常見的一句話，“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這個“中”字便不能以普通的含義解釋，便應當用歸納的方法，將墨子中的“中”字別為通釋，以求其義。他如所引用的故實，以及對某一故實、某一古人、某一古書的態度與批評，皆有別為通釋的必要。

(c) 標點——古書之難讀的原因很多，沒有標點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對古書有相當素養而又喜歡標點的人，應當做標點古書的工作。這雖不甚難，也並不甚易，坊間標點的各種子書如莊子集解、荀子集解之類，皆令人反倒讀不通，所以這並不是低能而膚淺的事業。幾年以前，顧頡剛先生邀集一班人從事於這種工作，他所擔任的史記已將完成，我所擔任的管子則殺青無日，這是我最負疚在心的一件事。但在最近的將來，我一定將最重要的幾部子

書標點(包括分段)一次。

(d)索引——中國書最是翻檢不易，要想在某一書裏找一點材料，必須從頭至尾披覽一次。這是治中國學的最大苦惱，也是青年怕讀古書的最大原因，所以應當爲最重要的古籍作索引。

上述四種工作，是整理古書、尤其是諸子文字內容的急先務，最好對任何一部重要的古書都施以四種工作的整理；而且將四種整理的成績合起來印成一書。不然，則做一種算一種，或只施以校註，或只施以標點，亦無不可，不過不如合施四種整理者之更完好而已。

(2)著作年代的研究——中國古書裏邊有許多掛名某人而不是某人的著作，諸書皆然，子書尤甚，無以稱之，稱之曰“偽書”。(新註：現在看來，有的可以稱爲“偽書”，如像列子尹文子之類；有的不能稱爲“偽書”，如像管子、莊子外雜篇等等。)稱之曰“偽書”者，只是表明它不出於掛名的某人之手，並沒有卑棄它的本身的價值的意思。本來就本身的價值而論，是不是某人所作，無甚關係；但就學術史而論，則作者之人的問題、時的問題，極爲重要。不是某人所作而強認爲是某人所作，往往使某人成了自相矛盾的人。譬如易經、孝經、孔子家語，以至讖緯之書都認爲是孔子所作，則孔子與孔子便自己開戰了。不是某一時代的書，而強認爲是某一時代的書，則學術史成了鬼怪錄了。即如列子若放在晚周的時代，無論如何，在學術系統上講不通。所以一部書的是不是掛名的某一時代的某人所作，抑另一時代的另一人所作，是研究學術史的先決問題。我近年來研究子書，研究古代文藝，在這一方面很消耗了相當的時間。這雖然是時代的賜予，但直接的影響，可以說是得之於梁任公先生與顧頡剛先生。梁任公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冊，是使我由研究諸子學說而走入考訂諸子真

偽年代的原動力。我自讀了他倆的這兩部名著，我便蓄志將所有的號爲先秦兩漢的子書都予以推考著作年代的研究。其實這種工作，是建設的，不是破壞的。我在管子探源的叙裏說：

著書託名古人，斯誠卑矣。然周秦諸子，靡不託古改制，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皆宜保存；惟疏通明辯，使還作主，而不贗僞古人，以亂學術之系統已耳。如列子出晉人，非列禦寇作，近已漸成定讞。晉人之書，傳者絕尠，據此以究戰國學術固妄，據此以究晉人學術則絕好材料，不得以其非列禦寇作而卑棄不一顧。故余以爲與其辯真僞，無寧考年代，始有功於古人，有裨於今後之學術界也。惟史料之書，其功用在史實，後人向壁虛造，自全無價值。如今本竹書紀年，全非汲冢之舊，淆混史實，錯亂年代，誠宜析辯而雜燒之。即言理之書，若文子之襲淮南，慎懋賞本慎子之納百家，割裂勦同，毫無詮發，原書可讀，何須乎此？亦應疏通證明，無使濫竽著作之林，而耗學子披讀之功。

這是我對偽書的根本觀念，也便是我勘訂偽書、推考著作年代的根本原因。我決定在十年以內，將自己及他人未確定年代的偽書，都考訂一次。全書出於一人的偽造者，則對全書施以綜合的考訂，如我已作的孔叢子探源、尹文子探源；全書不是一時之作，也不出一人之手者，則對全書各篇施以分別的考訂，如我已作的管子探源、莊子外雜篇探源。

（三）學說的研究——諸子是哲學書，以故學說的研究最爲重要，從事這種研究者也頗不乏人。但過去的學者每以不知科學方法，以致不是支離破碎，便是玄渺而不著實際。近來的學者，知道科學方法了，但又有隨着科學方法而來的弊病，就是好以各不相謀的西洋哲學相緣附，乃至以西洋哲學衡中國哲學。由是孔子成了

共產主義者，又成了新大陸輓近的行爲派的心理學家。前年見到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說預備着以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解釋老子。地之相去數萬里，時之相去數千年，居然有兩個人完全相同！試想孔老先生披上洋裝，擎起司提柯，革其履，絲其襪，真是豈不笑煞人也！二十世紀的歐洲新學術，紀元前的中國人已經講得爛熟，我想天地間沒有這一回事。而且這樣辦法，第一、助長中國人的誇大誑，說西洋人的新學問都是我國先民的唾餘。反之，第二、也助長中國人的自卑感，說中國古人有什麼學問，不過能偶同西洋人的學說罷了。第三、助長中國人的不讀西洋書，說行爲派的心理學書不必看，左右就是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第四、行爲派的心理學即使是珍貴的學問，我們孔老先生是否必須與之相同？世界上已有了真的行爲派的心理學家，何必造一冒牌的貨色，以亂其真？第五、中國的哲學，其價值是不是只在與西洋某一哲學家相同？假使如此，那末中國哲學，便根本不必研究。所以我研究諸子學說的根本方法，是：採取西洋的科學方法，而不以與西洋哲學相緣附。（緣附不是比較，以中國某一哲學家與西洋某一哲學家相比較，是很好的方法。）寫定的方法，分爲下述兩種：

（1）側重人者——又分爲四種：

（a）個人的研究——我之研究子書，最早即是從個人的研究入手，這可以說是受了梁任公先生的影響。一九二二年我讀到梁先生的墨子學案，在欽佩之下，掀動了作諸子學案的野心，於是計劃着先作孟子學案；已經寫了一些，被其他的幾種工作（國文之讀法、歷代白話文選注、北方言語考源、諸葛武侯尺牘輯注，後一種由掃葉山房出版）打斷了。從此遷延復遷延，直至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才以月餘之力寫了一本莊子學案。一九二六年的秋天又以二月之力寫了一本荀子學案，一九二七年夏又寫了一本孟子學案。梁任

公先生擬爲介紹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我自覺太幼稚，不敢問世。後來因了在河南中山大學、河北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擔任諸子概論的機會，才將我這諸子學案的工作完成。但每講一次，即發現從前的許多錯誤，以故仍然敝帚自珍，未以示人。

(b) 派別的研究——辨析派別，本來是研究學術的一種重要工作，尤其是諸子，九流十家，各有所宗，派別不明，動輒牴牾，所以各派的本身原委，以及與他派的相互關係，研究諸子的人有考究明晰的責任。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讀書的時候，即從事於十家源流考的工作，可惜現在尚脫稿無日也。

(c) 歷史的研究——派別的研究，是研究各派之分的歷史；歷史的研究，是研究各派之合的歷史。我在莊子學案第一章莊子學說之淵源裏說：

無論何人之學說或文藝，雖不能不歸功於作者之創造力，而自己之立場，前此之歷史，並時之社會，皆與之有極強之關係。此其影響雖千端萬緒，難以縷述；然約而言之，不外因自己之立場，觀察社會之急需，而對歷史上之學說或文藝予以積極的演進或消極的改造而已。

這是我由歷史的觀點以研究學術文藝的根本觀念，也可以說是根本方法。譬如孔子，他自己的立場是由貴族降而爲士，所以他的主張近於人文主義，對過去學說之積極的演進者爲禮，消極的改造者爲仁（詳拙編諸子概論講義）。此種工作，余擬稍緩時日，俟其他工作完竣後，再從事於此，因此即余最後目的之學術思想史也。

(d) 比較的研究——荀子說：“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解蔽篇）。又說：“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天論篇）。諸子都是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自成一家言者。既是自成一家言，則顯然與他家

異，顯然不是道之全體，也便不是最後的真理。莊子天下篇論述晚周思想，說“道術將爲天下裂”，便是指的這種現象。最有趣味的，如儒家主張厚葬久喪，墨家非之；墨子主張兼愛，而楊子又非之。其他如晚出的墨家和名家都提倡辯，而莊子荀子又都極力反對；莊子與荀子的反對的立場與論證又各不相同。即是屬於一家一派者，亦有極相反的論調，如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我們立在審判官的地位，而使他們互相辯論，互相駁斥，自然是非明而真理亦顯。這種研究法，最有趣味，亦最易收效。不但更能藉以將古代學術弄清楚些，而且可以訓練我們的分析力、裁判力，不致沾沾於一先生之言，爲一曲之說所囿蔽。這種研究，細分又可析爲四類，即：（甲）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派之整個的比較，如儒墨之比較研究或儒道墨之比較研究。（乙）兩個學派或兩個學派以上對某問題的比較，如儒墨兩家婚喪禮論之比較研究，先秦各家天道觀念之比較研究。（丙）兩人及兩人以上之整個的比較，如孔墨老之比較研究，莊惠之比較研究。（丁）兩人及兩人以上對某問題之比較，如孟荀論性之比較研究。可惜從事這種工作者還未見其人，我自己亦有志而未逮，所作訖者孟荀論性一篇（孟荀論性新釋，見哲學評論第三卷第四期）而已。

（2）側重學術者——此只有一種方法，即問題的研究。問題的研究和比較的研究有相同者；不過比較的研究側重人，此則側重學術問題。譬如以孟荀論性之比較研究標題，則其側重點在孟荀兩人對性的主張與論證及其所以有此主張之各人的原因；若以性論標題，則其側重點在性之本身及當時所有的性論。這種研究，其重要性可以說駕乎其他各種研究之上。因爲研究中國哲學的人，爲什麼總是仰賴於西洋哲學，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中國哲學名辭辭典，所以不能不使中國哲學家披上西洋的外衣。我久想寫一篇